繫之於神明

——處州民間信仰與早期地方歷史記憶的建構

杜正貞　　高天澤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提要

處州的行政建制在隋代和唐初頻繁調整，中央王朝在此過程中逐漸在這一地區建立起有效統治。唐末戰亂，成為該地歷史記錄中的斷裂點。但後世地方民間信仰又多視神明為唐末率領地方抵抗暴亂的領袖。這些神明大都是在宋代朝廷封神的浪潮中，由地方精英請求敕封並記錄下來的。他們通過將神明故事「歷史化」，在地方記憶、家族故事與大歷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繫。歷史事實（或其片段）多次出入於民間故事的流傳、神明信仰的實踐和金石、史志、譜牒的文字書寫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地方的、民間的記憶、傳說與正統/正史敘事融合在了一起，處州的早期地方史也由此建構起來。

關鍵詞：處州、民間信仰、歷史記憶、地方史

杜正貞，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歷史學院，郵編：310058，電郵：duzhengzhen@zju.edu.cn；高天澤，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電郵：1155248772@link.cuhk.edu.hk。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0—13世紀政治與社會再探研》（項目編號：22JJD770005）研究成果。

一、前言

中國以悠久的史志撰述傳統聞名於世，個人的歷史認知也常常嵌套於國家、地方與家族的史志框架之中。其中數量龐大的地方史志、名人傳記等文獻，共同塑造了人們對地方歷史的認知，也是連接朝廷正史、家族記憶和個人歷史之間的紐帶。但地方歷史記述同樣也是層累、篩選的結果，它們往往既錨定於關鍵性的歷史事件或時代節點，又經過反復的遺忘、挖掘和改造。本文以處州地區的唐末歷史敘述為個案，探討地方歷史記憶複雜的形成過程。

處州位於浙江省的西南部，是一個由仙霞嶺、洞宮山、括蒼山等山脈構成的廣闊山區，其中零散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山間盆地，甌江、閩江等河流均發源於這片地區。處州東南與溫州接壤；西南與閩北毗鄰，是自浙東入閩北的交通要道；西北連接衢州，進而與贛北相連。在兩浙諸州中，處州是開發最遲、建制最晚的一個。今天可見的關於宋代以前處州地區的史料寥寥無幾，大概只有幾篇零星的碑銘和廟記。① 但在明代以來地方志記載的地方神明中，卻有不少被追溯為唐末五代時期的人物，這些神（或人）特別與此時期的戰亂有關，其故事依託民間的信仰實踐保存至今。在本文中，我們試圖理解這一現象——為什麼唐末這一歷史時段在此後當地人的歷史記憶中如此特別？這些關乎唐末紛爭的歷史記憶又是如何形成的？在其他早期史料匱乏、斷裂的情況下，考察這些信仰的由來以及人們藉此所保留或創造的地方記憶，是否可以成為我們理解地方早期歷史脈絡的一條路徑？②

---

① 如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碑〉，收入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括蒼金石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頁659—660；權德輿，〈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成公神道碑銘並序〉，收入《新刊權載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4，〈碑銘〉，頁120—121；張碭，〈新移麗陽廟記〉，收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732，頁7556。

② 陳弱水曾詳細考察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他也認為，面對這樣史料匱乏的課題，需要「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在無法得到足夠原始材料的情況下，史家可以現有證據為基礎進行合理推測。此外，史家亦應擴展早期原始文獻之外的其他材料，凡能幫助史家推論過去的材料，皆可作為建立歷史知識的依據。參見陳弱水，〈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臺大歷史學報》，第63期（2019年6月），頁1—82。

二、處州的「誕生」

處州地處武夷山系北緣，在秦朝建立之前，可能都屬於「東越」部族的活動範圍。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滅楚，並將原有的東越之地合置為閩中郡。[③] 但魯西奇指出，秦王朝對這一地區的影響大概僅限於此前越國的核心地帶，而會稽郡南部和閩中郡仍處於越人首長的控制之下。[④] 在後世的處州諸縣之中，漢獻帝建安八年（203）孫堅所設置的松陽縣是最早的一個。[⑤] 漢末魏晉之際，處州地區所在的浙南閩北是所謂「山越」的天下。陳弱水通過分析具有強烈地域特徵的東南姓氏，強調山越具備較強的地域獨立性與文化獨特性。在孫吳不斷征討山越的過程中，浙南山區也逐漸得到開發，並與王朝政權接觸。[⑥] 孫吳赤烏二年（239），分大末縣（又稱太末縣）立平昌縣。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平昌縣為遂昌縣。隋唐時期是處州地區發展極為重要的轉折點。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廢永嘉郡設處州，下設栝蒼（原松陽東鄉）、松陽、永嘉、臨海四縣，此為處州設州之始。[⑦] 此後一直到唐代中期，處州地區的行政區劃頻繁變動，其新置或復置各縣情況如附表1。按《元和郡縣圖志》載，處州下轄麗水、松陽、縉雲、遂昌、青田、龍泉，總共六縣。[⑧] 概言之，處州各縣的設置多發生於唐代的前中

---

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14，〈東越列傳〉，頁2979。

④　魯西奇，〈漢晉間浙南濱海地域的歷史進程〉，載《中日學者第三屆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77。

⑤　熊子臣、何鏜，《栝蒼彙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93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2，〈沿制紀〉，頁464。松陽縣分設自東漢時期設立的章安縣。章安縣源自西漢初年征討東越後於靈江下游設立的回浦縣。司馬彪撰，劉昭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志第二十二，〈郡國四・吳郡〉，頁3489。孫吳太平二年（257），分會稽郡東部為臨海郡，松陽縣即屬臨海郡。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48，〈吳書三・孫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153。

⑥　漢末時期東南山地的開發歷程和行政措置，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26；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頁4—20。有關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的詳細論述，亦可參見陳弱水，〈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臺大歷史學報》，第63期（2019年6月），頁1—81。

⑦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1，〈地理下〉，頁879。東晉明帝太寧元年（323），分臨海郡設永嘉郡，下設永寧、安固、松陽、橫陽四縣。房玄齡等，《晉書》，卷15，〈地理下・揚州〉（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463。

⑧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6，〈江南道二〉，頁624。

期，除南宋時期新增設慶元縣外，唐代所奠定的行政格局一直到明代中期礦亂之後才有大的變化。⑨

地方行政區的增設和頻繁變動，透露出處州地區在隋唐時期的發展變化，也意味着唐代對處州地區的歷史而言有特殊的意義。但就在唐代剛剛大體完成地方行政布局後，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起兵反唐，處州所屬的浙東地區也受到間接影響。作為動亂時國家的財稅所倚，同時也充當朝廷河南戰場的後備力量，兩浙地區在唐肅宗一朝普遍增設了節度使。乾元元年（758），以戶部尚書、宗室李峘為浙江東道節度使，置治所於越州，下領八州，處州即其一。⑩但節度使的設置改易頻繁。⑪ 唐代中期之後到任處州的地方長官，如王昱⑫ 、第五琦⑬ 、王縉⑭ 、齊抗⑮ ，很多都是在朝廷激烈的政治鬥爭中落敗而出貶的失意者，這似乎也說明當時的處州仍處在王朝的邊緣。

但也正是這些官員的事功成為了本地最早的「被教化的歷史」。如齊抗，他在刺史任上曾於城北高地重新選址，修建處州州城以避水患。⑯據說在齊抗出任刺史之前，處州常有「山越寇攘，蕩覆城寺」，經過他的整治，「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⑰ 在這一時期，國家的文教系統也進入了處州地區。李繁於元和十三年（818）就任處州刺史，在他的任上建立了處州地區的第一座孔廟。這一事件由於韓愈和杜牧的碑記而成為後代地方

---

⑨ 關於處州所屬各縣的建制時間和析置由來，可參見譚其驤，〈浙江省歷代行政區域——兼論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89—416。

⑩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門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220，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條，頁7063。

⑪ 代宗即位之後，為削弱藩鎮勢力，於大曆五年（770）改浙東道節度使為觀察使。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又升浙東道觀察使為義勝軍節度使；光啟三年（887）改義勝軍為威勝軍節度使；景福三年（896）則改威勝軍為鎮東節度使。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68，〈方鎮五〉，頁1906、1923、1924；卷41，〈地理五・江南道〉，頁1061。

⑫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6，〈吐蕃傳上〉，頁5234。

⑬ 劉昫等，《舊唐書》，卷123，〈第五琦傳〉，頁3518。

⑭ 劉昫等，《舊唐書》，卷118，〈王縉傳〉，頁3418。

⑮ 權德輿，〈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成公神道碑銘並序〉，收入《新刊權載之文集》，卷14，〈碑銘〉，頁120—121。

⑯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26，〈江南道二〉，頁624。

⑰ 權德輿，〈唐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齊成公神道碑銘並序〉，收入《新刊權載之文集》，卷14，〈碑銘〉頁120—121。

歷史敘述的重點，也是處州儒學歷史的起點。[18] 直到清康熙年間，時任處州知府的劉廷璣重修府學，仍將處州地方學術之肇始追溯至李繁任官時期。[19] 但彼時孔子廟的興建，大概只具有官員試圖力行教化的象徵性意義。韓愈在碑記中寫道，處州地區的孔廟雖然修建完成，但「不能修事」，「名存實亡」。[20]

唐代的處州，道教和地方神明信仰都頗為興盛。以初唐葉法善和縉雲仙都黃帝祠為代表的道教在地方和中央都很有影響。[21] 關於地方神明的記錄，見之於張碭〈新移麗陽廟記〉。張碭曾於唐宣宗大中年間擔任處州軍事衙推。麗陽廟原名白塔廟，供奉的是被當地人視作能「鎮地脈」的土地神。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處州刺史徐鄂祈雨有應，將白塔廟與《新移麗陽廟記》所載不符，是祈雨→改名→計劃整修→未能實現改名為麗陽廟。他正計劃整修廟宇，卻因調任他所。大中八年（854），新調任的刺史姜肅和麗水縣令一同完成了這項工程。在麗陽廟中供奉的神明包括：

> 其正位麗陽王蓋北山之神；左則白塔王，斯土地之主；右則巨潭王，乃北沼之靈。三神名號雖圖籍罔載，冥搜可知，自開山導水有土地人民社稷以來，神則挺生，咸聞之。[22]

唐代處州的民間信仰中還未能看到具體的人物和故事，多是依據當地山川所形成的地方土神。所謂「圖籍罔載」表明這些土神與官方祀典也並無關係。同樣，按李陽冰在〈縉雲城隍廟碑〉中所記，他曾作為縉雲令向城隍求雨，以為城隍也仍然是江南土神。[23] 不過，麗陽廟重修前後還是發生了一些

---

⑱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收入《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846，〈碑三・儒二〉，頁4475；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收入《文苑英華》，卷846，〈碑三・儒二〉，頁4475。

⑲ 劉廷璣，〈重建圭山文昌閣記〉，收入光緒《處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9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28，〈藝文志中・文編二〉，頁1025—1026。

⑳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收入《文苑英華》，卷846，〈碑三・儒二〉，頁4475。

㉑ 有關中晚唐時期處州（栝蒼）葉法善信仰興起與流傳過程，可詳見吳眞，《為神性加注：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110—141。

㉒ 張碭，〈新移麗陽廟記〉，收入《全唐文》，卷732，頁7556。

㉓ 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碑〉，收入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栝蒼金石志》，卷2，頁659—660。

變化，作為「北山之神」的麗陽王取代了白塔王的位置，位居廟宇正位。官員在地方的作爲仍然表現了官方力量對地方信仰的改造或重新解釋。

綜上所述，隋代「處州」第一次作為行政建制出現在歷史舞臺上，隋唐時期是來自北方的正統王朝力量深入處州地區的重要歷史階段。從隋初的一縣到唐代中期的六縣，百餘年間處州的地方行政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零散的早期材料中，我們也第一次看到王朝國家是如何在處州與地方互動，以及地方官員是如何同這片「粗獷」的山林打交道的。不過，這些唐代的史料更多聚焦於王朝國家單方面的努力，而無法看到當地人對此的因應。

三、唐末紛爭中的處州地方豪強

如上文所述，大約在黃巢起義之前，處州刺史仍然由中央選派，他們留下了關於處州地方事務的最早文獻。但這些官方活動的記錄在唐末黃巢起義爆發之後便中斷了。乾符五年（878），黃巢引兵渡過長江，接連攻破饒、信、歙、虔等州，後攻宣州不克，轉而進攻浙東。黃巢起義軍沒有直接經過處州，而是掠過處州的北緣，於仙霞關開路七百里，攻陷福建，直入嶺南。[24] 何燦浩曾指出唐末黃巢起義之後，地方的獨立化快速完成。尤其是在唐僖宗中和年間之後，全國各地都逐步進入了所謂「動亂潮」或「獨立潮」。[25] 處州地區也不例外。原來就不是很穩固的控制變得更加脆弱，一些地方的勢力乘機脫離了唐的統治，其實也游離於當時他方節度使的控制。

郁賢皓在《唐刺史考全編》中曾對唐末時期的處州刺史進行了梳理。他認為處州在中和年間以後僅有三位刺史可考，[26] 分別為趙翊、華造、盧約。通過查閱後世史料，我們發現這三位刺史以及其他被後世認為是唐末處州刺史的人，其眞實身分都十分可疑。趙翊在《舊五代史》中有傳，但明確其為

㉔　劉昫等，《舊唐書》，卷178，〈盧攜傳〉，頁4638；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卷253，唐僖宗乾符五年八月條，頁8208。

㉕　參見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頁23—25；胡耀飛，〈黃巢起義對晚唐藩鎮格局的影響〉，《文史哲》，2017年，第4期，頁130—168。

㉖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2140。

「遙領處州刺史」，[27] 實際主要從其兄於陳州（今河南淮陽）活動，並未到任。盧約的事蹟記載在多種文獻中。《資治通鑑》載唐哀帝天祐二年（905）秋八月「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28] 這一記載可能採自《吳越備史》之記載：「處州刺史盧約弟佶寇永嘉。」[29] 其中盧約雖然名為處州刺史，但是以「寇」字記載他們的軍事行動，或暗示了盧約的眞實身分。《新唐書》中也言及中和元年（881）十一月，「遂昌賊盧約陷處州」[30]。也就是說，盧約最初的身分可能並不是唐王朝任命的刺史，而是一個地方上趁亂起事的「反賊」。此後盧約還依附於劉漢宏的麾下，[31] 劉漢宏被擊敗之後又在名義上歸順錢鏐。事實可能正如胡三省所言，此時的處州雖巡屬於兩浙，但實際上並不受錢氏節制。[32] 直到後梁開平元年（907），錢鏐在平定了衢州刺史陳璋之亂後，派他的兒子錢元瑨、錢元瓘進討溫州、處州，溫、處二州才眞正納入吳越國的控制之下。[33] 盧約則喪失了對處州軍事力量的掌控。

盧約佔據處州長達16年。後代史籍中幾個所謂「刺史」的「任職」時間也多與盧約據州的時間相重合。例如成書於五代的《續仙傳》中，有一則關於道士豐去奢的故事，其中記載了一位名為華造的處州刺史：

> 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險。（浙東帥具以上朝廷，議欲息兵，授造以為刺史。）而造凶險，聞去奢得丹劍，而囚鑠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屋，見奢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卻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神

㉗ 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4，〈趙珝傳〉，頁197。

㉘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卷265，唐昭宗天祐二年八月條，頁8645。

㉙ 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四部叢刊續編》本），卷1，〈武肅王〉，天祐二年秋八月條，頁36。

㉚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9，〈僖宗本紀〉，頁273。

㉛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90，〈劉漢宏傳〉，頁5488—5489。

㉜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卷263，唐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條，頁8588。

㉝ 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卷1，〈武肅王〉，天祐四年四月條，頁40。

仙告，卻歸石下。[34]

在這個充滿神話色彩的故事中，華造被看作一位在動亂之中據守一方的地方土豪，在朝廷無暇他顧時被授予處州刺史。由於沒有發現其他的佐證材料，如今這個故事的眞實性和具體細節已經難以考証，但是這類晚唐五代地方豪強被授命為官的故事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敘述套路。

類似的故事還發生在「施使君」身上。施使君名為施堅實，在《吳越備史》的記載中，施堅實和盧約一樣都曾是劉漢宏的部將。[35] 在錢鏐率兵大敗劉漢宏軍隊之後，施堅實降於錢鏐。但是在此後的史料中，施堅實被看作是盧約據州時期捍衛地方秩序的地方豪強，並且也成為了人們口中的「刺史」。相傳為明初宋濂所作的〈金華施氏宗譜序〉記載如下：

> 施氏肇自河南汴京，諱極者，遷於湖州德清，生四子：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元生清……文生質，文擢鄖陽府尹，生宏。宏生四子：長曰堅實，字敦夫，任栝蒼刺史，值盧約據州，集義兵誅約，封吳興郡公，贈妻趙氏吳興郡夫人，就彼居焉……堅實生四子：約銓、約言、約文、約禮。[36]

按照譜序中的說法，施堅實被認作是華峰施氏的先祖，在盧約據州時期為處州刺史，並最終在和盧約的競爭中勝出。這篇文獻署名為宋濂所作，但應該只是後人託名。因為文中所說的鄖陽府直到成化十二年（1476）才設立，不論是晚唐還是明初都不存在「鄖陽府」這一地名。[37] 這篇譜序成文時間大概在成化之後，而非明初，很有可能是在萬曆年間施家後人修撰族譜時，這一譜序的具體內容才最終定型。[38]

不論是盧約還是華造和施堅實，其所謂的「刺史」身分都十分可疑，其

---

[34] 沈汾，《續仙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上，頁15。

[35] 范垌、林禹，《吳越備史》，卷1，〈武肅王〉，中和四年春二月條，頁6。

[36] 宋濂，〈金華施氏宗譜序〉，收入《宋濂全集輯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卷9《餘集輯補》，頁2417；大致內容亦可見於施永禮，《華峰施氏宗譜》（清乾隆四十六〔1781〕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卷1，頁1—2。

[37]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4，〈憲宗本紀二〉，頁173。

[38] 吳宗之，〈華峰施氏重修宗譜序〉，收入施永禮，《華峰施氏宗譜》，卷1，頁3—4。熊子臣、何鏜，《栝蒼彙紀》，卷14，〈大事紀〉，頁676。

或是來自唐王朝對於地方亂局的默認，又可能只是他們佔據地方之後的自稱，或者是後代的附會。不過他們的故事表現出來的同構性也大致反映了晚唐時期處州的政治和社會情形：一方面，在動亂之中，唐王朝喪失了對這些地區的有效統治，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批擁兵自重的地方豪強，其中一些人四出劫掠、攻克州縣，另一些人則在本鄉結寨自保。而且在地方豪強之間也存在着衝突和競爭，直到吳越政權在這裡建立統治秩序，處州才逐漸歸於穩定。另一方面，這些豪強事蹟中充斥着佛道神明故事。除了前述道士豐去奢之外，現存宋明史料中盧約據州時期的作為，也多與佛教相關。《宋高僧傳》記載，盧約曾延請唐末時期的縉雲高僧有緣入處州，供施招待，[39] 對於有緣和尚所居之連雲院，盧約資助頗多。[40] 成化《處州府志》記載盧約據州期間重建處州州城的故事，與一位「三平和尚」的堪輿術有關。[41] 但是這些故事大都出自宋明之後的文獻，與眞眞假假的「刺史」頭銜一樣，它們首先應該被視為後代對這些大小豪強的歷史記憶。事實上，在宋明以後當地人的歷史記憶中，一直活躍着眾多晚唐時期的地方豪強，其中的一些人本身還化身成為地方的保護神。

四、民間信仰中的唐末故事

翻檢明清時期處州地區的地方志，可以發現許多地方神都被認為原是唐末保衛一方鄉土的地方豪強，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方豪強同時也是處州最早由人成神的案例，相關材料茲舉例如下。上文曾提到的華造，在明代遂昌的史料中就是一個受人供奉的神明，成化《處州府志》中記載：

> 華使君廟，在縣（按：即遂昌縣）東十里。神名造，唐景福間為處州刺史，死於賊。鄉人立廟祀之。[42]

---

[39] 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12，〈唐縉雲連雲院有緣傳〉，頁285—286。

[40] 李賢，《大明一統志》（成都：巴蜀書社，2017），卷44，〈浙江布政司・處州府・山川〉，頁2014。

[41] 成化《處州府志》（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修刻本，寧波天一閣藏），卷1，〈處州府・古蹟〉，頁26。

[42] 成化《處州府志》，卷11，〈遂昌縣・壇廟〉，頁15。

除了華造之外，成化《處州府志》當中還列出了一位名叫陳備的「處州刺史」，也是當地民眾所供奉的地方神：

> 陳府君廟，在縣（按：即遂昌縣）北五十里。神名備，唐時為處州刺史。文德初，與盜盧約爭州不克，歿而靈異，鄉人祀之。[43]

在如今所見的晚唐五代史料中找不到陳備的行為事蹟，但是在明代當地人的認識當中，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陳備」也是一位「處州刺史」，並以盧約的競爭者的身分出現。

據成化《處州府志》，在雲和縣有一座被稱為「獨峰廟」的廟宇，廟宇中供奉的陳俔，官至處州節度使。一篇署名為劉基所作的〈重修獨峰廟碑記〉中追述了陳俔的事蹟：

> 獨峰廟者，宋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陳公廟也。公嘗仕吳越王錢氏，自登進士第，歷職太常至處州節度散兵馬使，皆有聲猷。宋德龍興，錢氏納土，公以舊職涖事。既而陳璋、田頵猖獗於栝蒼，公奉朝命為討擊使，弟侯、俔、俛並列將校，設方略，勵兵戎，梟厥渠魁，悉平餘黨，於是烽煙罷警，耕織如初。[44]

和華造等人類似，陳俔在這個故事中也是自唐末到北宋時期平定地方叛亂的將領。區別在於陳俔並非本地豪強，而是朝廷軍隊的代表。不過，在目前所見的有宋一代史料之中沒有這位名為陳俔的處州節度使的蹤跡，據稱為劉基所作的這篇碑記如今也只見於《雲和縣志》。細檢文獻內容，可以發現很多疑點。田頵為唐末割據淮南的楊行密的部下，鎮守宣州，後遭楊行密猜忌起兵反叛，最終於天復三年（903）被鎮壓而死；[45]陳璋則為錢鏐部下，坐鎮衢州，後因與楊行密暗通款曲而在天祐元年（904）遭錢鏐征討，遂投降

---

[43] 成化《處州府志》，卷11，〈遂昌縣・壇廟〉，頁15。

[44] 劉基，〈重修獨峰廟碑記〉，收入同治《雲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71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7，〈祠祀〉，頁380。

[45]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門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卷264，唐昭宗天復三年十二月己亥條，頁8621—8622。

楊行密。[46] 上述事件都發生於唐末時期，他們沒有可能在北宋錢氏納土之後才遭到陳偘的鎮壓。所以，這一故事很有可能是後世的創作，或者是在記憶、流傳過程中發生了時間上的錯置。

此外，還有一位名為張軻的地方神，也被看作是唐末亂局時的人物：

> 金石岩，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北二十五里。唐末巢寇至此，邑簿張軻倡義率民駐其上以禦之。岩巔可屯萬馬。山頂出泉，為池有魚，歲旱不竭，基磧至今一一可辨。鄉民為立祠，奉之甚虔，水旱有禱立應。[47]

這段材料輯佚自現存《永樂大典》所收《處州府志》條目中，這一府志應該編纂於明代洪武初年。[48] 記載中張軻是唐代遂昌縣的一位地方官員，在黃巢軍隊經過時，率領當地民眾屯駐金石岩以保全鄉里。而按成化《處州府志》的記載，明代遂昌縣又有一吳僕射廟，廟中供奉的「吳僕射」似與張軻為同一人：

> 吳僕射廟，在大柘溪東。神名軻，唐末為保義鎮遏使。黃巢犯京師，四方雲擾，群盜蝟興。盧約陷處州，董昌攻越，軻集義勇、積糧糗，守禦一方，以功拜檢校工部尚書。既沒為神，凡有祈禱即應。[49]

在當地人看來，所謂的「吳僕射」就是在唐末率民避難金石岩的張軻，死後成為鄉民所供奉的神明。不過相比起洪武府志中的記載，成化府志敘述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張軻的身分發生了變化，不再是此前提到的「邑簿」，而變成了專職於地方守備的鎮遏使；二是其故事被放入更為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與唐末盧約據州一事建立了聯繫。這或許表明，成化府志的編纂者不僅僅是在地方訪聞張軻的故事，或是直接照錄此前的記載，他們

---

[46]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門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卷265，唐哀宗天祐元年十月庚戌條，頁8638。

[47]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2冊，〈浙江省・麗水地區・處州府志・山川〉，頁957。

[48] 洪煥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頁434—435。

[49] 成化《處州府志》，卷11，〈遂昌縣・壇廟〉，頁14。

同時還參考了正史記述，並想辦法將地方的避亂故事置入王朝歷史的敘述脈絡之中。

在上文所列舉的這些神明中，如果說華造還算是有「史」可考的話，那麼陳備、陳偓、張軻等人則可以稱得上是「不見經傳」，在我們所見的唐宋文獻之中，實在難以發現有關他們的蛛絲馬跡。不過這些神明故事的共同點依然值得我們關注。首先，他們的身分無一例外都是晚唐五代動亂中的地方人物，同時記述中又都被盡可能地歸入王朝官僚的序列。在一次次地方志編纂過程中，這些人物故事往往與在官方正史里可考的歷史事件建立起聯繫，他們或為盧約的競爭者，又或奉錢氏之命征討動亂，但是如果細究這些故事的原委，其眞實性又多少存疑。其次，在我們所見的明清方志中，他們紛紛化身為一方所祀的神明，成為當地人心目中的保護神。甚至可以說，他們正是借由神明的身分一直存在於地方民眾的歷史記憶之中。

針對這些故事，我們大概可以做出兩種可能的解讀：其一，一些眞正發生在唐末五代的地方史事失載於早期史書，但卻在民間通過信仰的方式記憶、保存下來，在明代以後被記入了地方志書中。其二，後代當地人習慣於將一些神明的事蹟附會於唐末五代動亂中，所以這些看起來傳統悠久的民間信仰故事，均圍繞着唐末處州動亂的主題。但不論是將這些故事理解為文獻失載後的再記憶，還是理解為後世的創作附會，這些民間信仰中的人物故事都成為正史記述「主旋律」下暗藏的「復調」。在故事的一次次講述中，人們試圖將這些或眞或假的地方史事、人物和大歷史的脈絡聯繫起來，定位它們發生的歷史情境。

這些目前留存於明清史料中的人物（神明）故事是如何被創作、記憶或再記憶的呢？又由何人創造或傳承？不論是史書之外的民間記憶還是後世的附會、演繹，這些故事均聚焦於唐末這一歷史時段，這一現象亦值得深究與解釋。當地人紛紛將地方神明故事的最早源頭繫於唐末的紛爭動亂之中，這背後究竟意味着什麼？

五、神明祖先故事的歷史化

上文所提到陳備、張軻等神明，記載於明清史料中，缺乏其早期產生、演變的綫索，很難做更為詳細的考訂。不過，另有一些類似的神明信仰，史料相對較多，且較為連貫，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述問題。

（一）梅瑴

在處州雲和縣，曾建有一福勝廟，同治《雲和縣志》中記載：

> 福勝廟。舊在黃溪洋，宋淳熙間建，祀唐武寧侯梅瑴，嘉熙四年賜額，有敕牒碑。[50]

福勝廟中祭祀的梅瑴，按清代人的說法，也是唐末人物，據稱在晚唐五代時期曾為經略節度使，死後受到鄉人供奉。不過據方志的說法，祭祀他的廟宇在南宋初年才得以建立，直到南宋末年，梅瑴才得到了朝廷的賜封。宋理宗嘉熙年間所刻的敕牒碑，其內容存於《栝蒼金石志》，其中記載了鄉貢進士梅一飛的請封緣由：

> 尚書省牒。……據鄉貢進士梅一飛等列狀稱：本縣有雲和黃溪洋經略節度使大將軍廟。本梅姓也，仕唐僖宗朝，繼仕五代，為大將軍者五人，曰趙、曰楊、曰張、曰祝、曰李。趙、楊將軍中亮大夫制置使行營右護軍，張將軍中衛大夫防禦使衛前護軍，祝與李皆親衛大夫觀察使行衛後護軍，生則同寓於鄉，死則因以立祠，遂血食於黃溪洋。[51]

在敕牒正文之前，還收錄了由梅成所作的序言，詳細追述了梅瑴的事蹟和請封的來龍去脈。根據梅成的說法，梅瑴的生命似乎出奇的漫長，作為唐末出現的人物，他歷仕唐朝、吳越國、北宋三代，並且在死後和他的五位部將一起得到了鄉民的供奉，屢現神蹟，尤其是在「鄰寇交警」的動亂環境中保障鄉里安寧。等到嘉熙年間，梅成的季父入朝為官，趁機與鄉里民眾聯手上奏，向朝廷請封梅瑴。在朝廷派人覈實神蹟之後，這一請求最終得到了首肯。值得注意的是，梅成在這裡也將梅家說成是梅瑴的後裔，而梅成追述梅瑴事蹟的證據，據說來自於其自家的家譜。[52]

---

[50] 同治《雲和縣志》，卷7，〈祠祀〉，頁373。
[51] 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栝蒼金石志》，卷8，〈雲和福勝廟敕牒碑〉，頁60。
[52] 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栝蒼金石志》，卷8，〈福勝廟敕牒碑序〉，頁62。

清代《栝蒼金石志》的編者李遇孫在整理這篇碑文時對於梅瑴的來歷頗感懷疑。他認為所謂的「梅大將軍」實際上「於史無考」，在他看來，此事「若僅據其家譜而言，往往多誇飾之詞，官爵事實俱不足徵，此有牒有狀似尚可信」。[53] 不過敕牒似乎只能證明，在南宋這一神明確實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而梅瑴其人究竟為誰還不能給出清楚的證明。但無論如何，在南宋，科舉中嶄露頭角的梅氏一族，將自己的祖先與神明聯繫了起來，並最終為國家所承認。

（二）金端公

處州地區留存至今的南宋神明敕牒碑中，還有一篇涉及所謂的「金端公」。《麗水縣志》中記載，州城城北二十里有一廟名為惠應廟：

> 惠應廟。在城北二十里甘泉圩。神姓金，佚其名。有宋嘉定八年賜額敕牒碑。敕牒碑陰記「金端公廟，父老相傳唐末山賊劫掠，為國勤兵至麗水縣二十五都武婆嶺，沒於王事，累顯神蹟」云云，餘多剝蝕。[54]

按府志的說法，金姓神的名字在當時已經無法得知，但是南宋敕牒碑還能看到，他也是一位在唐末動亂時安定地方的將領，並最終因此蒙難。府志對於金端公事蹟的追述就來自於南宋嘉定年間的敕牒碑。這一敕牒碑文現存於《栝蒼金石志補遺》。由於年代久遠，碑文早已漫漶不清，不過殘留的一些內容片段還是能提供非常豐富的信息。敕牒碑中記載金端公在沒而為神之後曾多次顯靈護佑鄉里，鄉人因此報請賜封。轉運司為覈實此事分別派衢州常山縣主簿和臺州寧海縣丞前去麗水查看，覈實之後朝廷正式予以封賜。敕牒碑中羅列了諸如祈雨、防蝗、保障豐收、護佑商旅平安等諸多神蹟，這些大都是同類敕牒中的慣常話語。但文中一些有關宣和年間兵亂的文字，暗示金端公得到當地人和朝廷的關注，與方臘軍襲擊處州有關。[55]

---

[53] 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栝蒼金石志》，卷8，〈福勝廟敕牒碑題跋〉，頁63。

[54] 同治《麗水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8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5，〈祠廟志〉，頁374。

[55] 鄒伯森輯，《栝蒼金石志補遺》（《聚學軒叢書》第四集，揚州：廣陵書社，1982），卷3，〈甘泉惠應廟尚書省牒碑〉，頁1—8。

在敕牒正文後的題跋中，清代的金石學者對金端公的事蹟和敕封經過做了較為詳細的梳理：

> 唐季巢寇方熾，延燎東南，山賊盧約乘亂據州治，刺史施史君領軍剿捕。公勒兵為前部，禦敵於栝之武婆嶺，大呼酣戰，力竭以死，而寇亦旋滅。……自公亡迄宋宣和，已二百餘年，當睦州賊寇蹂躪浙東，栝人皆避寇遠去，井里為墟。一日，相率禱於公廟，俄而雷轟電掣，陰雲蔽天，煙焰中見金鎧銀甲赫赫，如金端公飛騎而來，揮戈殺賊，官軍乘勝奮擊，遂敗遁，居民乃稍稍歸，安堵如常。爰議重建公祠，旋以他事不果。至南宋淳熙九年，鄉老虞興等咸以公迭著顯跡，凡旱蝗、疾疫、兵戎、水火之厄，禱無不應，迺出匯金為一邑倡，因而恢拓舊址，高其殿楹，增構廊廡……閱三十餘年，有司上其事，輾轉申朝廷，奉敕贈為惠應王，並賜廟額，時在嘉定八年春也。[56]

在這一段文字中，唐末盧約和施使君爭奪處州一事被加入故事中。金端公成為施使君的部將，並且在與盧約軍隊的作戰中戰死。在北宋宣和年間方臘軍進入處州時，金端公在戰鬥中顯靈，幫助鄉里民眾擊敗了方臘軍隊。到了南宋，在「鄉老」虞興等地方精英運作之下，得到了朝廷的賜封。

（三）章承趣

章承趣的故事以另一種方式將神明信仰與宋代的方臘之亂、地方宗族建設聯繫起來。成化《處州府志》記載宣平縣城東南靈顯廟中所祭祀之神名為章承趣，也是在唐末黃巢起義時帶領鄉民避難的英雄：

> 靈顯章侯廟，在縣東南六十里。侯諱承趣，唐中和年間黃巢亂，鄉民推為部領，捍禦有功，沒而為神。[57]

章承趣作為保衛鄉土的地方英烈，其相關記載最早見於唐代中和年間楊光所寫的〈赤石樓隱難記〉：

---

[56] 鄒伯森輯，《栝蒼金石志補遺》，卷3，〈甘泉惠應廟尚書省牒碑題跋〉，頁10—12。
[57] 成化《處州府志》，卷17，〈宣平縣・壇廟〉，頁10。

> 自乎開元之末（按：年號應為寶應），袁晁作叛，起於天台，攻陷當州，逃亡無數。惟此一鄉，人戶數百餘家，而登此樓，以逃其難……其後便乃清平，干戈不擾，人忘往難，無復再游。運轉年移，迄今為古其樓，近代居人，皆懼有神聖居止……以至中和二年，屢被洞寇侵逼……乃有耆父河間郡俞強，邀伴攀緣，登此樓頂。芟夷繁木，以創草庵；巧立層梯，而通行路。遂召鄉鄰老幼，共此逃形，寢寐安然。狂兵攻守，無路侵凌……而有武都郡章承趣，年當少俊，英傑冠時，文武全材，兵機洞曉，兼善安撫之理，尤明畏愛之方，鄉內欽依，眾皆推讓，蒙兵馬司僉差，部領數百衛士，佔獲家鄉，各藏財帛於數岩，共置軍部於老竹。外都畏懼，不敢來侵；戶口完全，耕稼無失……時唐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

楊光是唐代中和年間人，但是這篇隱難記全文現今最早見於順治《宣平縣志》。[58] 其名目現最早見於南宋王象之所撰《輿地碑記目》，其中並沒有抄錄原文，但記載：「唐青田縣尉楊光作《隱難記》。在麗水縣北六十里之東岩。大略言袁晁、黃巢之亂，民避難於此，獲免者甚眾。」[59]。萬曆年間的《栝蒼彙紀》里也提到所謂的赤石樓就是處州麗水東岩，並援引了部分《隱難記》中的內容。[60] 根據《隱難記》的說法，唐寶應年間，臺州胥吏袁晁叛亂。處州在這一時期也受到衝擊，鄉里民眾上東岩躲避戰亂，終得保全。而唐代中和年間黃巢起義時，處州又遭兵燹，當地人在俞強和章承趣的帶領下效法從前，避難東岩。

唐末的這次動亂應該給劫後餘生的當地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然而，章承趣是何時成神的並不清楚。在五代到北宋後期的史料中，我們沒能再次發現章承趣的名字。和上文所提到的金端公的情況相似，章承趣這一名字的再次出現，與北宋末年方臘起義相關。

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臘的軍隊攻克處州州城，[61] 方臘部將洪載先後率眾進擾松陽、遂昌等地。面對聲勢浩蕩的方臘軍隊，當地梁氏家族梁孚

58　楊光，〈赤石樓隱難記〉，收入順治《宣平縣志》，卷7，〈藝文志〉，頁13—15。

59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卷1，〈處州碑記〉，頁21。

60　熊子臣、何鏜，《栝蒼彙紀》，卷7，〈地理紀〉，頁578。

61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141，〈徽宗皇帝・討方賊〉，頁4424。

將兄弟舉眾戡亂自衛，避守東岩，最終保全了麗水的懿德、宣慈、應和三鄉。南宋淳熙四年（1177），梁孚將弟孚惠之子梁安世[62]任官紹興，請求韓元吉撰寫祠堂碑銘以記錄梁家功績。在梁安世看來，梁氏一族宣和年間的抗亂行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效法章承趣。韓元吉所撰〈處州東岩梁氏祠堂碑銘〉，後收錄在韓氏文集《南澗甲乙稿》內，其中也提及了唐末章承趣的避亂事蹟：

> （梁）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盡傾其家貲募壯士，得千人，即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東岩保焉……東岩者，四面斗絕，緣崖為門……自唐開元末，士人避袁晁之難嘗棲之。乾符、中和間，群盜繼作，章承趣亦固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樓，承趣廟食焉。故三鄉之民皆來歸。推將為部領，列保伍，定賞罰，凜凜若官府。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為暴。[63]

碑銘對於章承趣故事的敘述基本上來自於前文提及的隱難記。碑銘中提到處州東岩上已經建有祭祀章承趣的廟宇，這說明儘管在五代北宋的文獻系統中很難找到有關章承趣的身影，但是有關章承趣的故事和記憶可能以民間信仰這一載體延續了下來。

南宋淳熙年間，章承趣得到了朝廷的敕封[64]，其廟宇也得到了重修。一位處州當地名為蔡伯尹的人撰寫了廟記：

> 章公生於唐栝麗水，人文而武，州里所推。乾符、中和間，黃巢首亂，群盜蜂起，所在罹毒。……民德之，因壘為祠。……宋宣和庚子，方臘之黨洪載來寇，大父月山先生與梁主簿踵公遐武拒之。民羅拜乞福於公，有夢植護國旗，馳白馬，提兵而聞者。詰朝

62　梁安世，南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後任至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同治《麗水縣志》，卷10，〈人物〉，頁695。

63　韓元吉，〈處州東岩梁氏祠堂碑銘〉，收入《南澗甲乙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卷19，頁353。

64　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誰向朝廷申請賜封，章承趣的敕牒全文目前已經無法看到，但是在《宣平縣志》之中收錄了敕牒內容的節選。章承趣本人被封為仁烈侯，其妻子和女婿也同他一併受到敕封。見〈封處州麗水縣靈顯廟神仁烈侯敕〉、〈封處州麗水縣靈顯廟神妻助順夫人敕〉、〈封處州麗水縣靈顯廟仁烈侯四婿敕〉，收入順治《宣平縣志》，卷8，〈禮祀志・廟〉，頁3。

> 卻賊，訊其徒，言有飛空巨人壓陳而先，故敗。……公諱承趣，妻呂氏。婿四人，曰丁鄂、王修、蔡禋、鮑塵。蔡姓係吾祖免祖也，俱以功列於祠云。[65]

作者蔡伯尹，根據其壙志，為南宋處州麗水縣人，乾道二年（1166）登進士第。後歷任新昌主簿、溫州司理參軍、寧國府司錄參軍，淳熙十四年（1187）去世。[66] 在蔡伯尹的記述中，章承趣在方臘之亂中顯靈，護佑地方。但最重要的是，蔡氏將章承趣與自家的歷史聯繫起來。一方面據其所稱，蔡氏一族與前述梁氏共同參與了抵抗方臘部隊的戰鬥，並得到了章承趣的保佑。另一方面，蔡氏還說章承趣有四個女婿，其中的蔡禋就是自己的祖先。蔡、梁二人也許是出於張揚本家祖先功業的目的而重新發掘、記述了章承趣的故事，但章承趣也正由此得以保存於地方歷史敘述中。

梅瑣、金端公、章承趣這三個人物及其在唐末五代亂世中的事蹟，有多少是歷史眞實，我們已經很難確證了。但它們在當地的民間信仰和故事中流傳，這些記憶的「潛流」，在南宋時期進入地方歷史。清代道光年間《栝蒼金石志》的編者李遇孫曾對麗水南鄉彭城廟的一通碑刻進行了討論。在他看來，大約在宋元時期，溫處兩州都非常流行將地方小神附會為某人，並向官府請賜封爵：

> 宋元之間，聽命於神，鄉曲小廟，稍著靈異，便舉其人實之，並有舉其姓而不知其名者，因令甲有申覆請封之條，小民奔走如狂，欲邀朝命以說神，得有封爵與身受者無異，於是竭資創造，以祈福佑，其實皆出於虛無儻恍之言，事之不經，莫此為甚，而甌栝一帶為尤盛。舊志所載，不免類此。[67]

他認為，宋元時期民眾將一些於史無徵的鄉間神明附會成某個歷史「人物」。這與其說是一種「造神運動」，不如說是一種將地方神明「歷史化」或「史實化」的做法。正是通過將地方神明落實到唐末五代以及方臘起義的

65　蔡伯尹，〈重修章侯廟記〉，順治《宣平縣志》，卷7，〈藝文志〉，頁19—20。

66　蔡潮，〈蔡莘老壙記〉，收入李遇孫輯、鄒柏森校補，《續栝蒼金石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頁137—138。

67　李遇孫，〈彭城廟碑題跋〉，收入《栝蒼金石志》，卷9，頁83。

具體歷史中，並將祖先編織進這些神明故事，宋代地方精英將本身的家世、家史追溯至更久遠的時代。而且，唐末黃巢起義與北宋末年方臘起義都是王朝歷史敘事中的大事件，盧約與其他當地豪強爭奪處州的故事則是少數進入王朝視野的地方史事。宋代當地士人就通過地方神明的「歷史化」或地方歷史記憶的再發掘，在家族故事和處州、國家的歷史之間搭建起了橋梁。

至此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需要回答：處州地方神明故事的最早源頭繫於唐末的紛爭動亂之中，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如前所述，隋唐時期，王朝國家的統治才在眞正意義上進入了浙西南山區，這是王朝歷史和地方歷史敘述脈絡相遇的起始點。唐末，由於黃巢起義所帶來的地方動亂，處州暫時脫離了中央王朝的統治，以王朝敘述為核心的歷史書寫也與處州地方脫鈎。這段含混不清的歷史，既是地方精英需要填補的空白，也為他們提供了可以追溯乃至創造故事的空間。混合了歷史、傳說和民間信仰的唐末處州地方敘事也就在這一過程中最終形成。

五、結語：地方歷史記憶的競爭與地方史塑造

關於黃巢軍隊過後處州的地方形勢，後晉時期編纂的《舊唐書》基本無載，而在北宋中期編纂的《新唐書》中僅有寥寥一句話：

>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68]

盧約據州成為官方正史對唐末處州唯一的敘述。但這些正史的編纂者們可能無從想象也並不在意，唐末這一時期地方上究竟有着多少精彩的故事，又為後人留下了何其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們仍然有可能通過明清以後的史料去一窺處州晚唐五代的地方歷史，是因為一些故事在歷史記憶的競爭中勝出，成為地方史志、家族記錄的一部分。但是這個歷史記憶的競爭、整合過程顯然是漫長而曲折的。歷史事實（或片段）多次出入於民間故事的流傳、神明信仰的實踐和金石史志譜牒的文字書寫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地方的、民間的記憶、傳說與正統/正史敘事融合在了一起。

---

[68]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9，〈僖宗本紀〉，頁273。

學界有關神明信仰和地域社會的研究，早已揭示並強調了民間信仰如何成為紐結國家與社會的關鍵。[69] 在建構地方歷史的過程中，士大夫們熟練於將地方傳統納入國家正統敘事的操作。正如程美寶所言，「今人做地方史，須與傳統中國史意義上的『地方史』區分開來」。原因在於「後者表現之所謂『地方性』，每每是士大夫以朝廷/國家為中心營造出來的文化觀，其所關注的，是如何將地方的歷史敘述，納入國家的話語體系，表現其所謂『中國性』」。[70] 不論是對朝廷/國家的認知，還是以朝廷/國家為參照系的地方認知，都是一個不斷演化迭代的過程。不僅不同的地區與王朝國家相遇的起點不同，而且其後的歷史進程也不一樣。

自秦漢以來的很長時間，中央王朝對處州的直接控制僅局限於幾個「據點」，該地的開發進度遠遠落後於周邊地區。隋唐時期是至關重要的轉折點。在從隋初到唐中葉的一百餘年間，中央政府在處州增設了多個縣級行政區。但是這個過程在晚唐五代有一個明顯的中斷。安史之亂後，唐王朝逐漸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及至中和年間以後，處州地區事實上和唐中央王朝脫離了關係，成為地方豪傑互相爭搶的舞臺，唐末成為該地在王朝正史系統中歷史記述的一段空白。但是地方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卻頑強地留存在故事和信仰實踐中。進入宋代尤其是南宋之後，政治中心的變化再次拉近了處州和王朝的關係，迅速擴充的科舉錄取名額使得地方上出現了大量認同國家正統的士人精英。[71] 這些士人精英利用朝廷敕封神明的熱潮，[72] 一方面發掘地方原有的神明信仰、將其納入文字記述中，另一方面也發明新的故事，將本地神明、祖先以及與王朝、地方關鍵歷史事件有關的歷史人物，都聯繫起來。唐末這段原本很可能被遺忘的時期，由此定格為處州地方歷史記憶的重要節

69　如武雅士利用象徵理論整合中國民眾的信仰世界與官僚層級的對應關係；華琛等人強調民間社會和國家通過請求敕封和敕封地方神明的方式來塑造祭祀的正統性，使得王朝正統得以介入地方。見「國家建構與地方社會專號」，《歷史人類學學刊》，第6卷，1、2期合刊（2008年10月），頁1—171。

70　程美寶，〈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識：走出梁啓超的新史學片想〉，載《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17。

71　不算登科年代失載的17位，北宋時期處州總共有201位進士，南宋則多達570位。數據統計自龔延明、祖慧編著，《宋代登科總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有關南宋時期處州士人精英家族的研究，參見鄧小南，〈何澹與南宋龍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113—130。

72　關於南宋敕封地方神明的熱潮，除前述華琛等人的研究外，還可參見韓森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民間信仰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點。保家衛國的唐末英雄幻化成神的敘事甚至成為一種當地神明故事的格套，一直影響到明清以後神明故事的發明。我們在明清以後看到的處州早期地方歷史和神明信仰、祖先故事，它們其實共同經歷了反復相互建構的過程。在歷史中有神明的前世今生，在故事中散落着歷史的片段和眞相。

（責任編輯：武勇；實習編輯：楊淇驊）

附表1：隋唐時期所置處屬各縣

新（復）置縣名	設置時間	析置由來
栝蒼縣（後改名麗水縣）	隋開皇九年（589）	松陽縣分置
縉雲縣	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	栝蒼縣、婺州永康縣分置
青田縣	唐景雲二年（711）	栝蒼縣分置
遂昌縣	唐景雲二年（711）	原遂昌縣復置
龍泉縣	唐乾元二年（759）	遂昌縣、松陽縣分置

Sustained with the De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uzhou's Folk Beliefs and Early Local Historical Memory

Zhengzhen DU
School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Tianze G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Chuzhou experienced frequent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s during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s the dynasty gradually establishe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is region. The turmoil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a point of rupture in the local historical records. However, in later generations, local folk beliefs often regarded deities as leaders who led the local resistance against chaos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Most of these deities were canoniz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s wave of imperial enshrinement upon the request of local elites. The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memory, family narratives, and orthodox dynastic history. Historical facts (or fragments) repeatedly interacted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folk tales, the practice of deity worship, and the textual inscriptions in steles, local gazetteers, and genealogies. In this process, local and folk memories and legends merged with orthodox/

Zhengzhen DU, School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Zijingang Campus, Zhejiang University, Xihu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310058, E-mail: duzhengzhen@zju.edu.cn; Tianze G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ung King Hey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E-mail: 1155248772@link.cuhk.edu.hk.

offi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early local history of Chuzhou was thus constructed.

Keywords: Chuzhou, folk belief, historical memory, local history